

毛泽东
亲点的



★★★★★

罗元生 编著
欧阳青

十位将军部长



军事科学出版社

毛泽东亲点的十位将军部长

罗元生 欧阳青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亲点的十位将军部长 / 罗元生, 欧阳青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137-880-6

I. 毛… II. ①罗… ②欧… III. 部长—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427 号

责任编辑: 蒋风波

封面设计: 蒲伟生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 100091)

电话: (010)628826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毫米 1/16

版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 17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80137-880-6/I·097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公安部长罗瑞卿	(1)
第二章	横跨三个要害部门的部长	(23)
第三章	农垦部长王震	(51)
第四章	一叶飞舟的交通部长	(99)
第五章	社会部长李克农	(128)
第六章	石油部长李聚奎	(160)
第七章	从冀中名将到铁道部长	(177)
第八章	二机部长赵尔陆	(199)
第九章	独臂抱着金娃娃的石油部长	(213)
第十章	两度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	(245)

第一章 公安部长罗瑞卿

罗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红四军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我看还是让李克农来当公安部长更加合适”，罗瑞卿向周恩来建议道。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我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想去带兵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1949年7月6日，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工作，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任命

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军委公安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一个崭新的部门，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一切都是摸索着干，而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公安部门，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毛泽东点名让罗瑞卿出任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有着独到的眼光。

而对于这个任命，罗瑞卿根本没有想到，他甚至对毛主席的这个任命，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太原战役不久，罗瑞卿召集了一次军队干部会议，参加了一大段太原军管会的工作，然后回到十九兵团，作了一些交代。参加太原战役的部队，部分要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部分要西进解放大西北，十九兵团此时驻在山西平遥古城，正在作向西北进军的各项准备。有消息说，军委要任命罗瑞卿为西北军区政委，带兵进西北，罗瑞卿自己也作好了向西北进军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他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到军委公安部担任部长的电报。

面对着这白纸黑字的电报，罗瑞卿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有电令，他便匆匆收拾好，乘火车赶回北平。

罗瑞卿一回到北平，首先找到了周恩来，说，现在全国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仗也打熟了，叫我到公安部工作，我不大会做，还不如叫我去带兵打仗。

周恩来久久端详着罗瑞卿，一开始没说什么。良久，他拍拍罗瑞卿有些过高的肩头，诚恳地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把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了。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中央研究决定调你来当这个家。

“我看还是让李克农来当公安部长更加合适，他工作比我熟悉。”罗瑞卿又向周恩来建议道。

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中央早有考虑，他有他的事干。今天晚上，毛主席要见你，你不要在主席面前再提打仗了！

罗瑞卿点了点头。

当天夜里，李克农用车把罗瑞卿送到了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的住处。

在车上，罗瑞卿脑中还是在想着当公安部长的事：为什么毛主席偏偏看上了我，怎么没看上李克农？

早在1932年打漳州时，李克农就担任保卫局局长，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本行。他经验丰富，有智有谋，所以罗瑞卿建议公安部这个家由李克农来

当比较合适。可周恩来一直认为，李克农是党内著名的情报专家，之所以没有选他当公安部长，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各中央局及分局有一个电报，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好保卫和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李克农理所当然的是情报部长了，所以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

见到毛主席，罗瑞卿显得很高兴，可还没容得他说话，毛泽东就说：我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想去带兵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毛主席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还能说什么！

走出双清别墅，罗瑞卿向毛主席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很快，罗瑞卿就要向老部队、老战友们告别了。临行前，罗瑞卿向部队官兵们说，我真想带部队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到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毛主席、党中央让我做，那我一定服从命令，一定做好。

就这样，一转身，罗瑞卿正式离开了军队。

毛泽东为什么偏偏看中不愿离开军队的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呢？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想法。

在历史上，罗瑞卿干过保卫局局长，而且在西安事变时也干过中共代表的保卫工作，深得周恩来的信赖。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工作出色的爱将。

在漳州战役后，罗瑞卿就被任命为红军第一军团保卫局长。从第四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再到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大约3年，罗瑞卿一直在保卫局长的位置上，积累了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毛泽东对他出色的保卫才干印象很深。

罗瑞卿最早与保卫有关的是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随第四纵队在蛟洋一带担任警卫大会的任务。从此，便与保卫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没有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错误地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路线，致使根据地越打越小，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

罗瑞卿给保卫局讲整个局势和红军的前途，至于说红军这次行为为什么要撤出苏区，只说是为了打游击战，转到敌人的背后，要向敌人进行反击。

罗瑞卿向保卫局提出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掉队，不能逃跑，不能离开部队，保卫局要成为所有部队的模范。

此时，罗瑞卿尽管头部的伤口没有好，但作为一局之长的他，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就亲自出现在军团首长的身边，寸步不离左右，只是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每次有大的行动，罗瑞卿都要把全局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动员、交代任务，行军从哪里开始，打仗是怎么进行，保卫局如何配合工作等等。平时，罗瑞卿把保卫局的同志派到下边去，每个师三五人组成一个小组，休整时才集中。

在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军团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问题，这与罗瑞卿出色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罗瑞卿

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罗瑞卿作过一次这样的政治报告。罗瑞卿说，我们今天最薄弱的环节是侦察，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力气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伍，偏信口供、刑讯逼供的错误办法，我们不知有过多少痛苦的教训。直至今今天，还有不少的地方正在继续这种错误，这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如不立刻纠正，就用不着反革命分子来破坏我们，我们就是自己破坏自己。要真正做到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又不冤枉一个好同志，没有健全的侦察工作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侦察部门，是锄奸部门的灵魂，领导此工作的同志，随时都要记住这一原则；在谈到审讯工作时，罗瑞卿强调，要善于寻找搜集各方面的

材料，加以仔细的分析去构成正确的判断。切忌事先就准备好一个罪名，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去强迫对方承认，对于任何反革命的破坏，都必须有确切的证据，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犯人的口供上面，以刑讯逼供的办法，更必须绝对禁止。

罗瑞卿的这些观点，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毛泽东没有忘记，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曾发生过大杀“AB

团”事件的惨痛教训，当时的人都怕保卫局，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的话，只要保卫局一找谈话，那就是反革命无疑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遭到错误的杀害，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深重灾难。罗瑞卿坚持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及时纠正错误，这无疑是立下了大功。

毛泽东看中了罗瑞卿的才能。优秀的业务才能和合格的政治素质，使新中国的公安部长这副重担落在他的肩头。

★走马上任。罗瑞卿强调：国家公安部门应该是国家政权镇压反革命、确立革命秩序、捍卫国家安全的有力工具。打击盗匪流氓，狠抓制毒贩毒，取缔烟馆妓院……罗瑞卿重拳出击，很快，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宁。

公安部的“家”到底安在哪里？在办公用房紧张的建国初期，中央一时也没有定下来，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把一座英式兵营作为公安部的“家”。

这座兵营是英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建起来的，位置在天安门斜对面，北平市军管会刚一进北平，便把这座令国人屈辱的欧式建筑接收下来。中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的公安部驻扎在这里。

有了办公地方后，摆在罗瑞卿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班子建设，要组织公安队伍。周恩来批示将华北社会部的全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华北社会部原副部长杨奇清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公安部规划为六局一厅，即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治安行政局、边防保卫局、武装保卫局、人事局和办公厅，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从各个野战军调来的精兵强将聚集在他的麾下，徐子荣、邓少东、蔡顺礼等经验丰富、素质全面的一批同志都过来了，并且担任了领导职务。

班子的架子搭起来了，全国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也慢慢勉强配齐。可是中下级干部奇缺，特别是西南、华南和西北等地尤为严重。罗瑞卿心里没底，他想到了毛泽东主席，于是，就人才建设问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阐述自己的看法。

罗瑞卿认为，作为公安战线的人才，除我们自己努力培养外，必须由军队输送一批中下级干部，作为全国公安队伍的骨干。与此同时，罗瑞卿还给周恩来和代总长聂荣臻写了报告，要求从华北军政大学调一批知识分子来公

安部做参谋工作。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采纳了罗瑞卿的建议，很快，一大批军队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公安部，为公安部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看到一批批精干的队伍进入公安队伍，罗瑞卿心里踏实了许多。他由衷地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关怀、支持与厚爱。

然而，走马上任的罗瑞卿，等待他的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摆在案头的敌特情况和治安情况的汇报材料，使公安机关面临的局势很严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权虽然已经推翻，但反动的社会基础却并没触动。逃到台湾的只是少数国民党上层人士，为数很多的间谍特务分子、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仍滞留大陆。从缴获的敌伪档案材料可看出，在大陆的反动党团骨干和潜伏下来的间谍特务计 300 多万，加上盘踞在城乡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帮会把头和流氓恶棍等为数更大，仅北京市原有的形形色色的特务分子约 8000 多人，反动党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约 5000 多人。知情的反动分子交代说，这批人中南逃的不过 3000 多人，大部分都四处藏匿，虽大多不敢为非作歹，但还有不少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潜伏下来，伪装积极，混入国家机关和学校、企业内部，造成极大隐患。

1949 年 10 月 15 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

罗瑞卿认真准备，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他连续好几天亲自修改讲话材料，把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公安工作的指示精神吃透。在会上，罗瑞卿说，国家公安部应是国家政权镇压反革命、确立革命秩序、捍卫国家安全的有力工具。因此，必须学会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镇压内外敌人的一切捣乱和破坏，这就是我们的总任务。罗瑞卿要求各级公安领导同志，今后要善于行使政权的职能，用公安的形式保卫党、保卫国家政权、保卫人民。

在这次会议上，公安部准备在全国大体平定以后，逐渐接替人民解放军所担任的警卫内部和保卫边防的任务。周恩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大支柱，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周恩来讲的非常实在。公安部门不仅是天天要用，而且是每时每刻都要用。

上任伊始，罗瑞卿决定摧毁敌人的特务机构。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之

初，就通令已经解放的大中城市，要明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限时向公安部门登记，以利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并把他们的面目公开于群众面前。这样，既可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又便于公安部门以后更主动更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敌人，罗瑞卿在转发各地登记工作经验的通报中，对政策界限阐述得非常具体。

全国各省的反动党团登记工作进展顺利，罗瑞卿亲自考察了浙江省，并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他在报告中说，浙江城乡认真登记，既有充分准备，又能抓住时机；既坚持了政策，又讲究了策略；既打击了反革命，又配合了秋收和土改，步调一致，步骤稳当。

毛主席、党中央为罗瑞卿这一步棋叫好！

对反动党团进行登记，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但还有为数不少的反革命分子活动频繁。以上海为例，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发生持枪抢劫案19起，有时一天就发案16起，并且连续几个月案件居高不下，北京、重庆等地，情况也相差不大。

罗瑞卿说，盗匪问题在城市是个大问题，我们不镇压盗匪是要脱离群众的。我们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好社会治安，狠抓打击盗匪的行动。

罗瑞卿指导公安机关，对抓获的盗匪要从严惩处，凡是抢人的就要判刑，罪大恶极的要判死刑。对于惯匪，搞特务的或与特务有联系的要严办几个，杀与不杀，要从是否取得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出发，一般盗匪也应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于是，全国各地一场打击盗匪的运动轰轰烈烈迅速开展起来。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等13个城市的统计，从城市解放至1950年上半年，共捕盗匪5477名，各个城市都对盗匪有致命性的打击。对此，罗瑞卿非常高兴，他在北京市年终总结大会上说：北京与全国各地一样，战绩斐然。过去一个月发生强盗案几十次，白天抢劫，打死警察，强奸妇女，甚至明目张胆地在天安门开会。我们驻地附近就发生过抢劫杀人案。现在市区内抢劫案基本没有了，郊区还有也是个别现象。他们害怕人民政府的威力，不敢那么猖獗了。

解放初期，北京的流氓活动相当猖獗，有“三鸟一雁”、“三星团”、“攘子队”等，他们身带凶器，经常活动在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西单、西四等繁华地带，打群架，调戏妇女，骚扰群众，无恶不作。有个绰号

“一拳镇西单”的流氓头子金玉田，拿着匕首，碰到穿裙子的妇女就要掀开裙子看看，谁也不敢惹他，谁要是多说了一句也许就没命了。1950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遵照罗瑞卿的指示，接受人民的请求，一举粉碎了这些流氓组织，逮捕了首要分子29名，接着又公开惩办了有严重罪恶的头头和流氓分子14名，群众拍手称快。

新中国成立之初，旧中国一些丑恶的东西并没有完全随着旧制度的推翻而消灭，制毒贩毒、卖淫嫖娼等腐败肮脏的现象仍在毒害着人民、毒化着社会。在一些大城市，反动官僚、军阀、买办与一些地痞流氓相互勾结，开烟行、开妓院、设烟馆，坑害人民。上海市解放初期调查，全市制毒所有33处，从事毒品生意的人有3万多。重庆1950年初统计，贩毒和开设烟馆就有3084家，成千上万的吸毒者倾家荡产，瘾毙街头，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罗瑞卿积极督促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匪和流氓活动的同时狠抓禁毒。对发现和破获的大案，他要亲自过问具体指导。1950年1月，北京市公安局侦破了大烟毒犯辅臣，勾结天津禁烟局干部套购大量烟土，又通过派出所民警掩护装船，运往上海销售的特大案件。罗瑞卿得知后，非常气愤，他严肃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对内部人员参与作弊的要严惩，不管是禁烟局的还是公安局的，均要送法院分别判罪，要公开杀掉其中最坏的几个，以遏制毒害的蔓延扩大，否则毒犯气焰不能打下。

很快，公开贩毒售毒的烟馆再也看不见了，残存的毒犯只好转入了地下，不断地从香港澳门把大量的鸦片偷运内地。在广东、湖南等地的铁路部门，就发现走私运毒的案例。罗瑞卿及时把这些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让他迅速转告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决定，要在各地“三反”、“五反”的基础上，进行一次群众性的禁毒运动。

1952年7月底，公安部主持各地公安局领导参加了禁毒会议，对全国性的禁毒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会议确定：统一行动，集中破案，以收一网打尽之效。罗瑞卿强调说，解放以来，毒品之所以仍然秘密流传，屡禁不止，那些专事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是罪魁祸首。我们对他们要严厉惩办，从重处刑是完全必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多数应于判刑后实行长期的劳动改造。对于多数的一般毒犯和小毒犯，以及坦白立功的毒犯，一律从宽处理。

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行动迅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收到了大量的口头、书面的检举材料，获得了一批大案要案的重要线

索，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在打击禁毒的同时，各地还设立了戒毒所，强制戒烟。到1952年初，新中国仅成立3年，百年流行的烟毒就销声匿迹了。

妓院是旧社会的产物，那里是藏垢纳污、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妓院老板是城市封建势力的一部分，妇女受着封建黑暗的剥削和压迫。1949年11月12日，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集体办公会议上说，要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血债的妓院老板。集体办公会议一致同意罗瑞卿意见，作出决议，报告市委市政府批准，写成议案送市人大讨论，作出了封闭妓院的决议。聂荣臻市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了这个决议。

半个小时之后，在罗瑞卿的直接组织指挥下，全市出动干部和公安总队官兵2400余人，风驰电掣，在市民政局、市妇联等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将全市196家妓院全部封闭，对妓院老板视情作出处理，成立了妇女生命教养院，收养了1200多名妓女。

很快，继北京市之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进行了封闭妓院的准备工作。1951年3月，武汉市公安局就向公安部报告了他们取缔妓院的情况。1952年4月至9月，根据罗瑞卿的意见，上海市采取了改造“大世界”的断然措施，上海市公安局遵照上海市军委会的指示，在民政等有关机关协助下，多次行动，查封了全市所有的妓院，打击了明妓暗娼和卖淫活动，并对那些不幸的妇女检查身体，医治疾病，安排职业。很快，垃圾遍地的“大世界”变得干干净净，成为上海人民娱乐健身的好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公安局在中央公安部和罗瑞卿的直接指挥下，依靠党委，充分发动群众，连续不断打击盗匪流氓，打击制毒贩毒，取缔妓院，为保障人民生活安宁、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根本特点就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罗瑞卿说，“把公安工作置身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在工作中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群众的路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一个独特的创造”。毛泽东听后，起身带头鼓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内的一些反动势力开始抬头，杀人、放火、投毒等恶性事故时有发生，一些猖獗的反革命分子漫天散布谣言，诬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诬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对反革命分子

处罚过宽过软的一些做法不太满意。

罗瑞卿坐不住了，他决定到全国各地去实地考察情况。他把目光投向了广东、广西和江西三省，专题考察这三地的镇反工作。罗瑞卿认为，华南位于国防前线，广东有漫长海防，面临香港和澳门；广西与越南接壤，全省多处交通不便，反革命分子据险顽抗，或乘空钻入；江西自解放以来，干部、战士、民兵、农会积极分子被匪特杀害的达 7000 余人。基于此，他要亲自到这三个省份看看。

回来后，罗瑞卿把考察的情况认真分析总结，写成了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反革命势力重新抬头的原因：一是，我们在解放初期，虽然对一些反革命分子进行过搜捕、登记等工作，但在一些地方进行得不够坚决和彻底，特别是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因而就没有击中他们的要害，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被放过去了；二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对反革命分子的复辟阴谋放松了警惕，考虑到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产生了麻痹思想；三是，在若干地区，对于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应当采取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作了错误的片面的理解，以致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这实际上放纵甚至鼓励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罗瑞卿代表公安部向毛主席汇报，主张在时机成熟时，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分子等 5 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同时指出，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同时做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重大决策。

罗瑞卿具体组织实施了这一关键“战役”，他多次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周密部署镇反任务，提出具体政策和行动计划。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亲自审定了公安部的镇反工作计划，对罗瑞卿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同时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罗瑞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经党中央批准后，迅速派出了一批视察组，亲自到各省考察。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罗瑞卿考察了 11 个省市开展镇反的情况，经常向毛泽东报告镇反运动中的新情况新经验，起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参谋作用。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表示满意，在三四个月內，亲自批转了几十件各地镇反的报告，其中有 5 件，是罗瑞卿用第一手材料加班加点写的报告。

镇压反革命得到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他们把镇反看成是再次翻身。1951年5月17日，北京宣武公安分局在天坛召开大会，公审东霸天林文华，到会的群众达3万多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拄着拐杖或让人搀扶着来了。当4名罪犯被押入会场时，群情愤怒，控诉的声音如大海咆哮，一浪高过一浪。有哭的，有喊的，有的甚至当场晕过去了。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地说：“这一下可真翻了一个全身，毛主席给我作主，现在真正是咱老百姓的天下了！”坚决镇压反革命、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声经久不息。

这些日子里，罗瑞卿从没有过节假日、星期天，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特别是遇上开会或其他特别的任务，每天就只能躺两三个小时，甚至连轴转，但他心里很踏实。人民群众对镇压反革命空前支持，公安战线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想到这，罗瑞卿觉得再忙再累也值得。

然而，身体终究不是钢铁打成的。1951年10月下旬，过度劳累的罗瑞卿患了重感冒，高烧到摄氏40度不退，医生说已经转成肺炎了。公安部的其他领导来看他，让他马上住院，罗瑞卿就是不听。他强调说，现在工作抽不开身，一个小小的感冒怎么让我离开岗位？妻子郝治平急得眼泪往下掉，拿他没办法，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过，看着日渐消瘦、满脸病容的罗瑞卿部长，谁也没有什么好



罗瑞卿与妻子郝治平合影。

办法。最后，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有心计。他知道罗瑞卿最听毛泽东的话，只要毛主席出面让罗瑞卿住院，肯定能行。于是，杨尚昆把罗瑞卿生病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当即决定，立即把罗瑞卿送到医院住院，公安部的工作由副部长杨奇清主持。就这样，罗瑞卿才住进了北京医院。

可刚进医院没几天，等高烧降下来之后，罗瑞卿便嚷着要出院。医护人员没有办法，与其强行让他留在医院，还不如让他高高兴兴地早出院。

其实，罗瑞卿躺在病床上还要看文件资料，了解国际国内消息，他的心早已回到公安部了。就这样，前后住院一周多，他就返回了工作单位。

公安部刚刚成立时，由于公安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及公安部队的归属问题，意见上有些不一致。一天深夜，毛泽东召见罗瑞卿，一见面便说：怎么

了？是不是我已经同你们闹翻了？是不是因为我剥夺了你的兵权，不满意啊？

罗瑞卿目视着眼前的毛泽东，看到他一脸疲乏，估计他已经服过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便反复劝主席休息，说自己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意。回来后，罗瑞卿连夜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除就具体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外，再次表示了他本人决没有不满意的想法，并在信上说，昨夜看主席太疲劳，就没有把话说完，希望主席再找他谈一次。

罗瑞卿对毛泽东始终怀着无限的深情和敬意，每次到毛泽东那里，他都要嘱咐司机不要按喇叭，怕影响主席工作或休息。到了门口，罗瑞卿总要先到警卫班问问主席是否睡觉了，如果睡了，他就等着，请别打扰他，让主席多休息一会儿。毛泽东深夜办公，有时突然想起什么事要找罗瑞卿，罗瑞卿二话不说，尽管有时自己已经服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还是立即驱车到毛泽东住处。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凡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总司令那里来的电话，即使他刚刚睡下也要一定叫醒，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第二天，毛泽东便让罗瑞卿过去谈。

毛泽东热情地请罗瑞卿坐下，罗瑞卿诚恳地说：我由于没有很好地体会执行主席的指示，工作没做好，有负主席的委托和希望，引起主席的不安和焦虑，自己很惭愧，心情也很不安。罗瑞卿再次强调，自己对公安部队的归属问题没有意见。

“有错误不要紧张，改了就好嘛！”毛泽东轻松地说。

接着，他告诉罗瑞卿不要想得太多，好好工作就是了。

这次谈话，两人谈得很长，毛泽东可谓对罗瑞卿推心置腹，罗瑞卿对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感动不已。吃饭时间到了，毛泽东执意留罗瑞卿吃过晚饭再回去。

不久，公安部很快建立了直接向中央，尤其是向毛泽东本人请示报告的制度。仅1950年至1956年，据不完全统计，罗瑞卿亲自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的工作报告就有280多件。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罗瑞卿工作更加井井有条。他反复强调，镇反工作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领导下进行，党委领导是关键，公安机关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要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罗瑞卿一直坚持站在镇反工作的第一线，经常带领干部到各地考察工作，了解情况，检查督促，总结交流经验。重大的关系到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重要案件，都事先请示党中央审批。毛泽东对罗瑞卿送上来的报告很重视，亲自过问，作了很多批示，不少还转发了全国。周恩来对公安部观点明确、材料充分又简明扼要的请示报告十分赞赏，要求其他部门要向公安部学习。

1950年5月，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召开，罗瑞卿在总结报告中坚持了公安保卫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原则，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肯定了罗瑞卿的报告，指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中央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同年10月，中央发布了镇反的“双十”指示。

接着，罗瑞卿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考察了11个省市开展镇反的情况，以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直到全国性的镇反运动取得一定成绩后，党中央决定缩小镇反运动的范围。罗瑞卿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强调再捕再杀要严格控制范围，逐个审查名单，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一定要做到不捕不杀，捕了杀了就是犯错误。

到1953年，镇反运动已经3年了，敌我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是年夏天，罗瑞卿用40天时间，亲自到东北三省7个大中城市及一些农村考察，动笔给中央写了一个东北考察报告。在报告中罗瑞卿说，东北的镇反是彻底的，农村尤为彻底，城市中尚留有一点隐蔽下来的特务残余。罗瑞卿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很快也会变得大体如此。基于此，罗瑞卿指出，目前同我们作斗争的敌人主要是隐蔽起来、伪装起来和被敌人不断派遣进来的间谍特务，建议应适时加强同隐蔽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

中央非常重视罗瑞卿的报告，刘少奇亲自批准后，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贯彻。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罗瑞卿在会上作了《全国肃反工作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在发言中，罗瑞卿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领导镇反，肃反运动的主要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根本特点就是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罗瑞卿说，“把公安工作置身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在工作中实行放